

美國新社會史的興起及其走向

王心揚*

新社會史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於美國的史學派別。它從研究普通人——工人、移民、黑人和婦女——的活動入手，用「自下往上看」的方法來觀察美國歷史。這種嶄新的研究方法不但揭示了許多從來未暴露過的史實，而且對一些已成定論的問題也都提出了質疑。新社會史給美國史學界所帶來的衝擊，不啻是一場地震。這個史學派別興起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六十年代的社會大變動。當時，婦女、少數民族和移民都起來抗議種族和性別歧視。於是，書寫這些普通人的歷史也就成為時代的要求了。實際上，階級、性別和種族成了社會史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禁酒運動為例。禁酒運動一向被認為是新教徒向天主教移民發動的一場攻勢。可是新社會史用階級和性別做為史學分析方法對禁酒運動重新進行認識以後，卻令人信服地指出，這個運動還具有階級衝突和婦女要求解放的一面。許多雇主提倡禁酒是擔心工人酒後會影響工作，婦女則飽受丈夫酒後毆打之苦。新社會史總的趨勢，是把問題研究得越來越細。這樣一來，雖然研究的成果越來越精確，卻使得關於美國歷史的總的解釋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關鍵詞：美國社會史 新社會史 美國史 美國學

新社會史是本世紀六十年代興起於美國的史學派別。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觀察歷史，因而不但揭示了許多過去未曾討論過的問題，並且對相當一部份已成定論的問題也都提出了質疑。就給史學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歷史系

界帶來的衝擊之大而言，以往的任何學派似乎都不能與新社會史相提並論。有人甚至將這種衝擊比做是一場地震。這場地震由於積聚了幾十年的能量，一旦爆發出來，便衝垮了所有舊史學所建築起來的隄壩¹。就其影響力之久而言，新社會史從它的興起至今歷三十年而不衰，而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還必將繼續左右美國的史壇。鑑於新社會史的巨大影響，有必要以中國人治學的眼光對這個學派的功過是非做一個全面的檢討。然而，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把這個學派的興起及其走向大致勾畫出一個輪廓來，許多優秀的社會史著作都因而不能給以足夠的注意，甚至一些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也不得不一帶而過。掛一漏萬，恐怕在所難免。

我們都知道，政治史和思想史在美國史壇上長期佔據主導地位。社會史一詞雖然很早就已經出現，但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私生活。由於它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上層人物的活動上，這種社會史和政治史、思想史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分界線。新社會史則一反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治學常規，將研究的重點完全轉移到社會上最普遍的人物——工人、移民、婦女、黑人等等——和他們的活動上去了。認同於新社會史的學者，不論他們之間有哪些歧見，都一致認為，美國社會是由不同階級、不同種族和不同性別的人所構成，因而美國文化也是一個多元和具有衝突的文化。只著眼於上層人物的經歷，不研究普通人的活動，便不可能全面瞭解美國歷史的本質。由於新社會史學家是從普通人入手去研究歷史，他們

¹ John Higham, "Introduction," in John Higham and Paul K. Conkin eds.,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xiii.

將自己的治學方法稱做是「自下往上觀察歷史」(viewing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

從思想層面上看，新社會史的興起是對所謂「和諧史學」(consensus school)的一種挑戰。「和諧史學」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到六十年代初在美國史壇上獨領風騷近二十年。這個學派的一個主要關懷是探索所謂美國思想和美國性格(American character)。一批有影響的史學著作，如康瑪格(Henry S. Commager)的《美國思想》²和霍夫斯坦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國政治傳統》³，就是在這個時期問世的。在研究其它課題的史學著作裡也同樣瀰漫著一種「和諧」的氣氛。比如，移民史學家一律都認為，移民從歐洲到達美國以後，很快就丟掉他們固有的文化傳統而同化於美國社會。在和諧史學家看來，美國社會的本質，倘若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和諧而無衝突。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正是美蘇之間的冷戰不斷加驟的時期。面對蘇俄這個勁敵，美國需要自信，也迫切需要自身的團結。在這種形勢下，強調美國社會的和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六十年代，新社會史起而強調多元和衝突，這和當時的社會環境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以大動盪而著稱。首先是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美國的少數民族，包括黑人、印地安人、墨西哥人和亞

²Henry S. Commager, *The American M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and Character Since the 18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³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8).

裔，經過五十年代和種族主義的幾次較量⁴，這時已普遍開始覺醒，再加上有不少白人支持他們，於是便大張旗鼓地出來抗議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一些黑人甚至表示不惜用暴力和種族主義者決一勝負。與此同時，婦女運動也逐漸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女權主義者向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她們要求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和平等陞遷的機會。到了六十年代後期，越戰的不斷陞級也引發了社會上的普遍不滿。很多大學校園裡都爆發了激烈的反戰運動。民權、婦女和反戰運動又常常匯合到一起，演變為暴力和流血衝突。這些暴力事件使得一部份史學家開始對「和諧史學」的觀點產生了懷疑。他們察覺到，美國的社會和文化似乎並不和諧，而是充滿了緊張和衝突。

這些史學家進而發現，現存的歷史書籍大多為男性和白人作者所著，它們所反映的不過是男性、白人和中產階級新教的文化，並不能代表全部美國文化。以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這個概念為例。共和主義始終被認為是全體美國人共同追求的目標。可是經過社會史學家對不同階級和不同性別的美國人進行分析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原來，美國人對共和主義的理解一向因為他們階級背景和性

⁴研究民權運動的學者一般都認為，五十年代所發生的兩次事件，即一九五四年聯邦最高法院對「布朗控告堪薩斯教育局」一案(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所做的判決和一九五五年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抵制公共汽車的示威活動(Montgomery Bus Boycott)，嚴格說來就是民權運動的開始。一九五四年，一個名叫布朗的黑人送他的女兒到堪薩斯的一家公立學校去讀書，但是遭到拒絕。教育局要他把孩子送到黑人學校去。布朗不服，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表示，在學校實施種族隔離是違反美國憲法的。一九五五年，一名叫帕克(Rosa Park)的黑人婦女在蒙哥馬利市搭乘公共汽車，她拒絕坐到為黑人保留的座位上，從而遭到逮捕。結果全市黑人舉行遊行，抗議種族隔離制度。

別的不同而見仁見智。對於十九世紀初期的技術工人來說，共和主義意味著自由勞工制度和向上陞遷的機會，可是商人卻把它解釋成取消政府對貿易的限制。到了中產階級婦女那裡，共和主義和「受教育的公民」成了同義語，而勞動婦女則認為，**republicanism** 可以保證她們不淪落為奴隸。這些學者還領悟到，即使是研究美國的政治史，如果只把精力集中在上層人物的活動上，其研究結果也會是片面的。因為在民主社會裡，選民的情況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而選民對政治問題的看法和投票方式往往因為階級背景、種族和性別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紐約州的民主黨長期控制在愛爾蘭人手中，而意大利移民及其後裔因為和愛爾蘭人不睦，每逢選舉便會去投共和黨的票。這些新發現進一步促使學者們去探索美國文化多種族、多階級和不同性別的本質。

新社會史的興起除了是受六十年代社會動亂的激盪以外，來自歐洲和美國思想界的影響也值得重視。多年來，法國的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一直主張研究事物的內在結構。他們認為，研究普通人的思想和生活習慣有助於發現歷史事件形成的架構。本來，這個學派對美國史學界的影響並不明顯。可是到了六十年代，新社會史要對不同團體和不同地區的歷史做具體研究時，年鑑學派所提倡的觀微知著的治學方法就忽然變得有吸引力了。此外，社會史學家還受到行為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影響，開始追求研究結果的準確性。他們覺得人文學科的治學方法過於主觀，只有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其研究結果才會比較客觀和精確。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社會學家派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治學方法。派森斯認為研究事物的結構可以促進對社會制度的理解。在派氏看來，國家和社會所發生的變化都是因為新興事件對現存結構的挑戰而引起的。這種挑戰的結果會導致一種新的社會平衡(social equilibrium)。

近年來在歐美學術界重新抬頭的馬克思主義也啓發了相當一部份社會史學家。馬克思主義認為，思想、制度和人的行爲都有它們的物質根源，因而歷史的發展從屬於某些科學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對立是由生產關係所決定的。所謂社會平衡不過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機制(mechanism)，這種機制是用來為經濟上的不平等做辯護的。不論新社會史學家是否都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這個標籤，馬克思主義在他們身上的影響已經是一個不容懷疑的事實。其實，美國新社會史的幾位開拓者如葛特曼(Herbert Gutman)和蒙哥馬利(David Montgomery)無一不是師承於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湯普遜(E. P. Thompson)的。湯普遜在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明確指出，「階級的經驗主要是受生產關係制衡的」⁵。不過，湯普遜和馬克思的觀點頗有不同之處。在湯氏看來，階級的形成不僅僅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同時也是由於文化上的原因。事實上，人的階級意識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文化形式表現出來的，如傳統、價值系統、思想和制度等等⁶。《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對工人階級在從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文化，特別是技術工人的傳統和宗教，做了深入的檢討。我們知道，馬克思曾經預言，階級意識和對資本主義的反抗將產生於工廠工人當中。可是湯氏卻用大量的史實證明，在工業革命發生以後，率先產生階級意識的是技術工人，而不是工廠工人⁷。湯氏的研究不僅把工人的文化提上了社會史的議事日程，而且他的著作也樹立了一個研究工人階級地方史的典範。比《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稍晚些時候，美國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

⁵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 p. 9.

⁶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10.

⁷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 240-241.

他的名著《對文化的解釋》中也鄭重提出，只有研究文化的特殊性才能發現人類文明的真正含義⁸。紀爾茲的告誡進一步促使社會史學家深入探討普通美國人的地方史。

前面已經說過，新社會史認為所謂「美國思想」和「美國性格」都是從上層人物留下的畫面文字中得出來的結論。現在社會史學家既然是致力於研究工人、婦女、黑人和移民的文化，探討這些最普通的美國人如何居住、如何遷徙，以及如何投票，而且對每一個城鎮、每一個地區的歷史逐一進行細緻的研究，那麼很明顯在史料的選擇上也必須另闢蹊徑了。新社會史雖然並不忽視精英份子所留下來的文字，但他們更主要的是從工人的講話、工會的記錄和移民的書信、報紙中去挖掘普通人的文化。可是大多數工人、移民和婦女所留下的文字畢竟不多，於是許多社會史學家又深入到工人、移民和黑人當中進行調查，把這些人的談話記錄下來，做為研究的史料，從而開創了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傳統。新社會史不但要探討工人、婦女、移民和黑人的地方史，而且它的研究涉及到制度、思想和習俗等重要課題，有關新社會史的著作之多，真可謂「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了。不過，為了論述的方便，本文只就勞工史、婦女史和少數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個評論。因為階級、性別和種族一向被認為是造成美國多元文化和社會衝突的三大基本因素。

⁸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43.

勞工史(Labor History)

勞工史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末，創始人是威斯康辛學派的康門斯(John R. Commons)。康門斯是治經濟學出身，但興趣卻在歷史方面。他有關於勞工問題的著作是對古典經濟學的挑戰。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主張市場的絕對自由，這個學派既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反對工人組成工會同雇主進行集體交涉。康門斯和他的學生們卻起而為工會進行辯護。他們認為工人有權組織工會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康門斯學派主要是研究市場對工人的技術、生活水準和組織能力的影響。不過，他們始終把精力放在工會的活動上，換言之，他們研究的是制度而不是工人的文化，所以被稱為制度學派(*institutional school*)⁹。康門斯學派對勞工史的研究一向受到承認和尊重。不過，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即使在工會運動的鼎盛時期，也只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工會成員，制度學派只研究很少一部份工人的歷史，其侷限性是不言而喻的。他們忽略工人的文化，更使大家無從瞭解工人歷史的全貌¹⁰。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問世以後，我們對美國工人文化的瞭解才真正是日新月異了。新社會史並不反對研究工會，但它的主要精力是放在那些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身上，它不但研究工廠的工人，而且將農業工人、黑奴、護士和百貨商店的售貨員都包括到勞工史的範圍之內。

⁹David Brody, "The New Labor History," in Eileen Boris and Nelson Lichtenstein eds., *Major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Workers* (Lexington and Toronto: D. C. Heath, 1991), pp. 2-4.

¹⁰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p. 10-11.

新社會史的一個主要關懷，是美國工人對工業化後的環境所做出的反應。多年來，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一直被當做是全體美國人的工作倫理。可是葛特曼在分析了不同類別的美國工人文化以後，卻令人信服地指出，新教倫理遠不是全體美國工人共同遵循的價值觀念。因為來自美國鄉下和歐洲的移民陸續加入到工人的行列裡，美國工人階級經歷了一個不斷形成和不斷更新的過程。這些移民工人帶來了許多前工業社會的工作習慣和文化傳統。比如，農民的作息時間非常靈活，他們從來不受固定時間的約束，而是隨日出而作，隨日落而息。這些移民到了美國的工廠裡，立刻受到固定工作日和固定工作時間的限制，於是，兩種工作倫理之間的衝突便不可避免了。雇主雖然不遺餘力地去改變這些前工業社會的工作習慣，但收效甚微。

在十九世紀初，新澤西的工廠主經常抱怨他們來自英國的工人不服管教。據說這些移民工人因為經常喝得酩酊大醉而耽誤生產。賓西法尼亞的工人也喜歡飲酒，而且經常不辭而別，一起去打獵或一起到海邊去消遣。葛特曼還發現，女工的工作習慣也和新教倫理格格不入。很多工廠甚至因為女工不服廠規而不得不關閉。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移民的來源變為東歐和南歐，但前工業社會的文化和工業文化之間的衝突則是有增無已。比如猶太人在東歐長期從事小商業和手工業，習慣於靈活的作息時間。這些移民到達紐約以後不得不到工廠去做工，但他們對大工廠制度始終抱有敵意。來自波蘭和意大利的移民有一套和新教完全不同的節日，每逢這些時刻，工人們也常常不辭而別，使生產陷於停頓¹¹。

¹¹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pp. 4-23.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工業革命以前，技術工人是工人階級的主體。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技工和商人對共和主義的理解迥然不同。其實，早在獨立戰爭時期，技術工人就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了。美國革命雖然是由上層社會人士所領導，但技術工人自始至終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鼓吹革命最力的佩因(Thomas Paine)本人就曾經是一位技術工人。他的革命宣傳實際上根本沒有脫離技術工人思想的影響。佩因把公德解釋為獨立公民對國務的積極參與，這種解釋同技術工人追求自由和小財產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到了十九世紀初，社會上的貧富懸殊日趨明顯，技術工人認為這種現象不啻是對民主社會公民權的出賣。他們總是選擇華盛頓的生日進行集會，抗議這種不公正的現象。威蘭茲(Sean Wilentz)的《高唱民主》一書便細緻地描述了紐約市技術工人的獨立文化。每逢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節，技術工人不但高舉星條旗，宣誓效忠於共和國，而且還遍插自己行業的旗幟。技工對獨立、平等和公民權等概念都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解釋。他們認為，「獨立」不僅象徵著獨立於英國的殖民統治，而且對於美國公民來說，還意味著獨立思考的權利和行動不受限制。此外，他們還把「獨立」解釋為防止將技術工人淪為奴僕。技工的領袖時常告誡大家，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不顧社會的安危。每個公民都應該把社會的利益置於個人得失之上，這才是真正的美德。技術工人的這些理想顯然是針對唯利是圖的商人而發的。不過，技術工人自己卻從未放棄對小股財產的追求，也從不主張為那些沒有技術的窮人開創一個經濟上平均的社會。直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後，喪失了財產的小工場主才陸續出來反對「人為地劃分社會財富」。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是工業革命給美國社會帶來巨大變動的時刻。技術工人位於商人和工廠工人這兩個階級之間，本來還有希望擠身到社會的上層。可是，隨著機器生產的來臨和工廠制的建

立，他們淪落為工廠工人的可能性倒是越來越大了。因此，他們不但特別珍視自己的小股財產，而且認為只有擁有小股財產和獨立的人才具有公民資格，也只有這些人才能很好地行使這種權利¹²。

另一位和葛特曼齊名的社會史大師蒙哥馬利則是集中精力探討生產車間(shop floor)裡的文化。他的研究結果顯示，工業革命發生以後，工人並非被動地接受剝削，而是圍繞著由誰來控制生產這個問題同雇主不斷地進行抗爭。工人對生產的控制採取了三種不斷演進的方式。最早的一種形式是技術工人的自治。技工擁有某個行業的專門知識，因而能決定自己和自己的助手應該如何工作。在工業革命的初期，機器生產尚未普及的情況下，技工的專門知識仍然很重要。雇主因為很難找到其它人來代替技術工人，所以往往不得不聽由技工自己去控制生產。在俄亥俄州的哥倫比亞鐵工廠裡，技術工人通過談判迫使雇主把年產量固定下來，然後自己再把這個產量攤派到每個工人的頭上。蒙哥馬利還發現，技術工人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moral code)，這些準則要求每個人在雇主面前都要表現出丈夫氣概，決不能在工頭面前退縮。實際上，許多技術工人在工頭出現在面前時都會拒絕繼續工作。到了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工人控制生產的另一種形式是通過工會制訂生產規則，然後迫使雇主接受這些規則。工會將自己制訂的規則稱為「立法」(legislation)。例如，國際機械工人工會對學徒的年限、工資的標準都有具體的規定。該工會還禁止它的會員操縱一部以上的機器。玻璃窗工人工會對生產有多達六十六條的詳細規定。工人為生產過程立法，表明他們對生

¹²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1-102.

產的控制從自發性轉變為有組織的行動。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工人控制又出現了第三種形式，即同情罷工(sympathy strike)。同情罷工主要是為支援其它行業的工會而舉行的。當一些工會為貫徹自己制訂的生產規則而和雇主爭執不下時，其它行業的工會便會宣佈舉行罷工以示支持。同情罷工常常能迫使雇主做出讓步。在一八八七到一八九四這七年裡，有三分之二的罷工是由工會有意識地發動的。這些罷工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增加工資，而且也是為了對生產進行控制。蒙哥馬利的研究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史學對美國工人的看法。過去大家普遍認為，美國工人的文化是個人主義的，現在我們才知道，美國工人有著很強的互助精神¹³。

工人的工餘生活是工人文化很重要的一部份，因此它也是新社會史學家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和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相比，美國工人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已經有了比較固定的閒暇時間。工人在工餘時間都做什麼？都有那些娛樂活動？這些娛樂活動的社會意義是什麼？這些都是制度史所不能回答的問題。羅森斯威格(Roy Rosenzweig)對工人工餘文化的探討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瞭解。本來，在整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工人在做工時都有飲酒的習慣。可是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在禁酒運動的影響下，工廠裡開始禁止工人飲酒。隨著工廠禁酒的不斷推廣，酒館(saloon)便應運而生了。酒館為工人提供了一個單獨的娛樂場所，工人在這裡可以進行社交、唱歌，移民工人在這裡還可以欣賞自己民族的音樂。由於酒館在工人工餘生活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工人將它稱為自己的俱樂部。

¹³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ork, Technology, and Labor Strugg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9-31.

雖然大部份酒館都排斥婦女和少數民族，但它們的內部則是相當民主和平等的，而且充滿團體主義的精神。羅森斯威格認為，工人的酒館文化是對工業文化的一種挑戰。工人完全不理會上層社會所倡導的節省和儲蓄等價值觀念，而是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在酒館裡度過自己的工餘時間。酒館文化更深一層的社會意義是在於，它使工人從工廠的規章制度中徹底解放出來，在工廠以外的地方享受充份的自由。在十九世紀的美國，飲酒具有明顯的階級性。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的人士一般都在自己家中或是在俱樂部裡飲酒。而工人卻是去酒館中和自己的同伴喝得酩酊大醉。羅森斯威格覺得，這種放蕩不羈的場面正是工人階級的詩意所在。譴責酒館文化的主要是牧師和工廠主。工廠主強烈要求政府限制發放酒館的營業執照，主要是擔心工人飲酒會耽誤工作¹⁴。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新社會史將黑奴也包括在工人階級的範圍之內，所以，勞工史和黑人史頗有重疊之處。詹諾維斯(Eugene Genovese)在深入探討了南部種植園的工作情況以後，發現黑奴的工作倫理更不是新教倫理。事實上，黑奴對奴隸制始終在進行反抗，這種反抗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黑奴雖然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甚至連家庭關係都未得到法律承認，但他們仍然想出一切辦法對奴隸主的權威進行巧妙的限制。黑奴有自己單獨的價值系統，他們相信自己是從事生產因而對社會真正有貢獻的人。在肯塔基州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段故事。有一個黑奴問他的主人，他在樹上發現了兩個蜂窩應該給他什麼報酬。主人對此大惑不解，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樹，為

¹⁴Roy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6-96.

什麼要爲自己樹上發現的東西付錢呢？黑奴卻回答說，倘若不是他的努力，主人自己是不會發現這些蜂窩的¹⁵。詹諾維斯還引述了大量史實，證明黑奴並非像傳說的那樣懶惰。黑人最初生長在非洲，對熱帶風光和大自然有著深厚的情感。他們被賣到了美國的種植園以後，並不甘心像牲畜一樣被奴隸主驅使。黑人所抵制的並不是繁重的工作，而是那種機械式的、精神上毫無收穫的工作。如果主人用皮鞭強迫他們去做這種工作，黑奴便會用最笨拙的方式去應付，其效率之低，不難想像。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耕作時，黑奴們便幹得非常努力。許多黑奴在禮拜天和節日也常常願意爲主人工作，以便多掙一些錢。另外，根據許多被解放黑奴的回憶，他們每逢碰到心地慈善的主人，便會儘量爲他多做些工作，但是如果遇到心腸狠毒的奴隸主，便會儘量怠工¹⁶。

詹諾維斯還告訴我們，黑人表面上雖然比較順從奴隸主，但順從的目的是爲了集體生存，以待時日。黑奴的家庭觀念非常強，南北戰爭以前曾經有大批黑奴逃亡，他們逃亡除了是爲了尋找自由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爲了和失散的子女、父母、妻子和丈夫團聚。黑人被解放以後都迫不及待地登記自己的婚姻，使之合法化。此外，黑人教會在黑奴群體自覺的過程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參加教會的活動使黑人有機會脫離奴隸主同自己人聚會，從而感覺到一種團體的力量。黑人基督教還使黑奴感受到，在上帝面前自己也有一定的價值，如果沒有本人的同意，其它人的意識是不能

¹⁵Eugene D.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p. 306.

¹⁶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pp. 303-314.

強加在自己頭上的。黑人對神學的原罪理論不感興趣，但他們卻清楚地意識到，奴役其他人就是一種罪過¹⁷。

婦女史(Women's history)

新社會史的分析方法也給婦女史帶來重大變化。早期的婦女史著作主要是記載婦女對美國社會的貢獻。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女權主義學者開始用性別做為史學分析方法來探討美國婦女的經歷，婦女史便成爲一個研究婦女文化的學術領域。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在使用「性別」這個詞彙時，新婦女史學家都不再使用sex一詞，而是改用gender。在女權主義者看來，sex主要是指男女生理上的區別，而男性至上主義者一向就是以「男女之別本係天生」爲理由對女性進行歧視的。現在新婦女史學家使用gender一詞，目的就是暗示男女之間不同的經歷是社會原因而非生理原因造成的。

我們前面討論勞工史的時候，曾經提到十九世紀的禁酒運動，並且指出這個運動具有階級衝突的性質。長期以來，史學家始終把禁酒運動看做是新教的改革派向天主教徒發動的一場攻勢。新婦女史用gender做為分析方法對禁酒運動進行探討以後，發現這個運動除了上述的那些性質以外，還有婦女要求解放的一面。在整個十九世紀，丈夫酒後毆打妻子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按照美國當時的法律，夫妻之間給對方造成損害後都不必承擔法律責任。這種狀況自然引起了許多婦女的不滿。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女權主義者便力倡禁酒和修改離婚法，要求給被毆打的婦女以提出離婚的權利。與此同時，婦女基督教禁酒協會也力促通過新法律，給醉漢的妻子訴

¹⁷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pp. 246, 451-452.

訟丈夫的權利。經過她們的努力，一些州陸續通過法律，允許被虐待的婦女控告酒商，因為酒商賣酒是造成醉漢毆打妻子的直接原因。雖然婦女暫時還不能直接控告她們的丈夫，但這畢竟是朝著婦女解放邁出了一步¹⁸。

新婦女史尤其注重婦女是如何表達自己的意願和主張的。一九七六年高爾頓(Linda Gordon)發表了《婦女的身體、婦女的權利》一書。高爾頓在研究了美國婦女節育的發展過程以後告訴我們，十九世紀女權主義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爭取「自願做母親的權利」(voluntary motherhood)。女權主義者首先是提倡房事必須經夫婦雙方都同意才能進行，希望以此來抵制男方的性要求。然而在男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裡，所謂雙方同意，歸根到底，仍然還是以丈夫的意見為準。於是女權主義者又進一步提出，婦女有權單方面拒絕丈夫的性要求，她們認為這是實現「自願做母親的權利」的前提。高爾頓提醒我們，十九世紀的法律和社會習俗都規定，婦女在房事方面必須服從丈夫的意願。現在女權主義者主張婦女有權拒絕丈夫的性要求，並提出「婦女佔有和控制自己身體的天賦權利」之說，這明顯是對男性至上主義文化的反叛。不過，婦女提出這些要求並非意味著她們對性行為不感興趣。她們所以要求單方面拒絕房事的權利，只是反對按丈夫的意願去行房。同時，女權主義提出這些要求也是為了避免房事給婦女帶來的諸如懷孕、生育和墮胎等危險。十九世紀美國醫學上有一種迷信，認為婦女在行房時倘若態度冷漠，不表現出任何興奮，就可以避免懷孕。高爾頓認為，當時許多婦女在行房時表

¹⁸Elizabeth H. Pleck, "Feminist Responses to 'Crimes Against Women,' 1868-1896," *Sign* 8: 3 (1983), pp. 452-454, 462-463.

現冷漠，都是相信這種醫學迷信的結果。其目的是爭取「自願做母親的權利」¹⁹。

懷爾特(Barbara Welter)在她〈對真正女性的崇拜〉一文中，把十九世紀教會和男性道德家為婦女制定的行為標準歸結為虔誠、貞潔、家居和順從(piety, purity, domesticity and submissiveness)等四德，並指出這四德是被強加到婦女身上的²⁰。懷爾特的觀點曾經引起了不少爭議。反對她的人認為，所謂四德是懷爾特從男性所留下的文字中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婦女並不一定遵守這些道德律。可是科特(Nancy Cott)在七十年代末卻公開提出，十九世紀的美國婦女參與創造了維多利亞式的兩性關係準則。科特認為，婦女對「性」的冷漠是想從以男性佔統治地位的性關係中解放出來，重申自己的尊嚴。婦女有了貞潔，使她們感到自己在道德上比男性要高尚，這有利於她們獲得社會上和家庭中的某些權利。因此，婦女自己至少是接受了貞潔這一德²¹。

凱普蘭(Temka Kaplan)通過對一九一〇年巴塞羅納事件的分析，發現婦女和男性的關懷很不相同。一九一〇年，西班牙巴塞羅納市的一名婦女發現她七歲的女兒受到了性侵犯。立刻，全市的婦女都行動起來了，很多人在女童的家門口舉行集會以示同情。當警察向這位母親施加壓力，要她保持緘默時，婦女們更加感到憤怒，鄰居們

¹⁹Linda Gordon, *Woman's Body, Woman's Right: A Social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in America* (New York: Grossman Publishers, 1976), pp. 103-107.

²⁰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in Barbara Welter, *Dimity Convictions: The American 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1-41.

²¹Nancy F. Cott, "Passionlessness: An Interpretation of Victorian Sexual Ideology, 1790-1850," in Nancy F. Cott and Elizabeth H. Pleck eds., *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A Touchstone Book, 1979), pp. 174-175.

甚至徹夜不眠進行抗議。當時，全市的男性工人正在罷工，要求實現九小時工作制。雖然工人的女性親屬對罷工也表示關心，但凱普蘭發現，全市婦女更爲關切的是對婦女的性騷擾和對兒童權益的侵犯。當女性受到騷擾時，她們會把它看做是對整個婦女界的冒犯，而且會很快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團體。凱普蘭把婦女之間의共同關懷稱爲「婦女意識」(female consciousness)²²。「婦女意識」這一觀點的提出進一步推動了對婦女文化的研究。

新婦女史也改變了我們對婦女工作問題的看法。傳統觀念普遍認爲婦女從來都不工作，女權主義史學家卻認爲，這種傳統觀念是男性上層人士觀察上層社會婦女的生活後得出的結論。上層婦女不必爲生計操勞，而且她們大都雇有女傭，連家務都不必過問。同時，按照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標準，做工也不適於女性。然而事實上，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大部份婦女始終在工作。除了照顧子女和烹飪以外，小工業城市的婦女還從事養雞和種植蔬菜，並以出賣家禽和雞蛋來貼補家用。此外，還有很多婦女通過照顧寄膳者(boarder)來增加收入。更多的美國婦女則是把工作拿到家中去做。在十九世紀初，美國工廠每年出產的布匹只有六萬五千碼，而婦女在家中生產的布則高達二十三萬碼²³。很顯然，男女之間只是分工的不同，不能以有無工資收入做爲工作和不工作的標準。新婦女史的這些新發現不啻是給「工人階級」一詞重新下了定義。

女權主義史學家還認爲，婦女進入工廠做工的數目比男工人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工人歧視婦女的結果。男性工人既不願放

²²Temma Kaplan,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Barcelona, 1910-1918," *Signs* 7:3(1982), pp. 545-566.

²³Mary P. Ryan, *Womanhood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3), p. 75.

棄他們做爲一家之主的地位，也不願放棄對好工作的壟斷，因此總是設法阻撓婦女進工廠工作。新婦女史學家還發現，工會領袖對婦女也始終抱有偏見。他們覺得婦女不具有戰鬥性。可是，婦女史學家通過對工會運動高漲年代的研究，卻發現婦女的戰鬥性並不亞於男工。此外，工會領袖還認爲工會應該是男工人的俱樂部，如果有婦女在場，會給男工人放蕩不羈的熱鬧場面潑冷水。基於這些原因，工會領袖總是反對婦女入會，所以婦女工會會員的人數一向比較少²⁴。

少數民族史(Ethnic History)

在討論了新勞工史和新婦女史的情況以後，我們不難想像，少數民族史是用「種族」和「民族」做爲史學分析方法去研究黑人和其它少數族裔的經歷²⁵，從而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揭示美國文化的多元性。由於近一半的美國歷史和奴隸制密切相關，黑人在奴隸制下的生活始終是黑人史的重點研究項目。黑人史學家一般都認爲，儘管黑人生活在殘酷的奴隸制之下，但他們還是在不斷地創造著自己的社會和文化。閱讀過布萊興格姆(John Blassingame)《奴隸社會》一書的人都會發現黑奴對自己家庭極端重視。黑奴們懂得，家庭是使他們得以生存下來的一個重要機制。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設法

²⁴Alice Kessler-Harris, "Where Are the Organized Women Workers?" *Feminist Studies* 3 (Fall 1975), pp. 92-110.

²⁵在美國的學術界，少數民族史一般是使用ethnic history一詞。不過，大部份學者都認爲有色人種的歷史和歐洲移民的歷史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有色人種的歷史所涉及的是種族(race)問題。歐洲移民及其後裔雖然也受到很多歧視，但他們畢竟是白種人，他們享受比有色人種要好得多的待遇。他們所涉及的是一個民族問題(ethnicity)。

使自己的婚姻合法化。黑奴每逢舉行婚禮，總是親朋滿座，場面十分熱鬧。布萊興格姆發現，雖然有些黑奴同時擁有兩個妻室，但很多人則始終保持一夫一妻的家庭²⁶。

葛特曼把對黑人家庭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他的《奴隸制度和自由制度下的黑人家庭》一書，除了以豐富的材料描述了黑奴對核心家庭的重視以外，還詳細探討了黑奴的家族關係。葛特曼發現黑奴在給子女取名的時候，不是承其父字，便是襲用其它血親之名，這表明黑人把非洲的家族傳統移植到種植園的生活中去了。黑人這樣做，顯然是爲了使下一代不忘記自己的血親，以便使自己的家庭傳統延續下去。黑人被解放以後，到政府那裡去控訴奴隸主虐待兒童的，不僅僅是父母，而且還包括祖父母、姑母、姨母、叔父和舅父等家族成員。另外，葛氏還發現，許多黑奴都祕密保持著自己從非洲帶來的姓氏。他們表面上雖然接受了主人的姓，但實際上卻保持著自己的家族傳統。這一切都說明，黑奴並非認同於奴隸主階級，而是和自己的伙伴結成一個獨特的社會²⁷。

萊文(Lawrence Levine)的《黑人文化和黑人意識》一書也是探討黑人文化的典範。萊文是通過分析黑人的故事、謎語和歌謠以後把這個文化挖掘出來的。以講故事爲例。黑奴普遍認爲，白人有學校和書本，可以接受正式的教育，而自己不具备這些條件，所以應該靠講故事來傳播自己的文化。黑人有許多講故事的高手，他們通過講故事對時事和白人進行褒貶，將自己的是非觀一代代傳下去。例如，有一則廣泛流傳的故事，說喬治·華盛頓臨終時一再囑咐他左

²⁶John W. Blassingame, *The Slave Community: Plantation Lif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78, 86-87.

²⁷Herbert G.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pp. 194-198, 207,230-237.

右的人，「要永遠把黑鬼壓在社會的底層」。黑人當中還廣泛流傳著傑克遜總統咒罵黑奴的故事。他們將傑克遜稱做是「骯髒的老流氓」。但黑奴對林肯總統卻充滿了溢美之詞。另有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說有一匹叫做傑克的騾子有一天忽然會講話了。傑克抱怨說，主人總是過份地奴役它，連禮拜天都強迫它工作。主人見到傑克會講話，嚇得魂不附體，從此再也不敢虐待這匹騾子了。這則故事的意義是在於，它告訴下一代，黑奴儘管沒有任何權利，但仍然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類似這樣的故事對黑人是很大的鼓舞²⁸。

二十世紀的黑人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黑人城市化的歷史。從本世紀初開始，由於城市裡勞動力的短缺，黑人不斷地離開南部的農村，遷移到北部的工業城市尋找工作。黑人脫離了南部種族壓迫的制度，遷移到北部較為自由的環境裡，有利於他們訓練自己和積聚力量。到了六十年代，黑人成了民權運動的主力軍，這和他們城市化的經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奧索夫斯基(Gilbert Osofsky)的《哈萊姆：一個貧民窟的形成》和斯皮爾(Allan Spear)的《黑人芝加哥：一個黑人貧民窟的形成》都是追蹤黑人城市化過程的名著。《哈萊姆》一書描寫了黑人北上到紐約市以後，如何在黑人中產階級的引導下，逐漸把哈萊姆區從一個白人鄰里改變為一個黑人的貧民窟。奧索夫斯基雖然承認種族歧視在黑人哈萊姆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主要還是強調黑人自己的主動性。紐約的黑人不僅僅把哈萊姆看做是一個貧民窟，而且還把它看做是自己的社區²⁹。伯徹特(James Borchert)

²⁸Lawrence W. Levine, *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Afro-American Folk Though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88, 91.

²⁹Gilbert Osofsky, *Harlem: The Making of a Ghetto, Negro New York, 1890-193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的《華盛頓胡同裡的生活》是一部更能反映黑人城市生活的社會史著作。通過本書對首都華盛頓黑人街巷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黑人不僅僅是城市裡一系列問題的犧牲品，他們也同時營造了一個有生命力的黑人社區。《胡同裡的生活》詳細描述了黑人社區經過各種困境所磨練出來的團體主義精神。黑人保護自己「領土」的願望非常強烈，當警察進入黑人社區企圖抓人時，黑人便會全體出動對警察進行襲擊。伯徹特告訴他的讀者，黑人在奴隸制時代就已經培養出對付工頭的技巧，現在用同樣的方式來對付警察，只不過是這個傳統的繼續³⁰。

廣義來說，移民史也屬於少數民族史的範圍。移民史本身所包括的內容十分廣泛，不但涉及到移民原住國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而且要探討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不過，爲了不脫離本文的主題，我們在這裡準備著重討論移民的文化問題。美國是個移民國家，美國人及其祖先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這已經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³¹。但是最先移民到美國的英國人憑藉自己多數民族的地位，早已經爲美國的制度、宗教和文化定下了基調。這個新教的安格魯·撒克遜文化長期以來容不得其它的移民文化，對於來自其它地區的移民，不是企圖拒之於國門之外，便是要求他們認同於自己的文化。

³⁰James Borchert, *Alley Life in Washington: Family, Community, Religion, and Folklife in the City, 1850-197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pp. 131-136.

³¹在目前少數民族不斷向種族主義挑戰的情況下，「美國是個移民國家」這種說法也已經不再是天經地義的了。印地安人的辯護士們指出，美國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因為在白種人到達北美以前，印地安人至少已經在那裡生活了上萬年了。所以，我們在使用「移民國家」一詞時，必須十分小心。

本土主義者(nativists)和外來移民之間的衝突，早在十九世紀初期愛爾蘭人和德國人移民到美國的時候便已經開始了。愛爾蘭和德國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們截然不同的教儀已經引起新教徒的普遍不滿。此外，天主教徒臣服於羅馬教皇，這更是一個令新教徒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現實。土生美國人甚至擔心這些天主教徒是受教皇的指使，前來顛覆美國社會的。新教徒不但時常襲擊愛爾蘭和德國移民的教堂，而且還專門組織了政黨，試圖以立法的手段來限制天主教的移民浪潮。可是天主教移民畢竟越來越多。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又有大批天主教徒從波蘭和意大利移民到美國，同時還有上百萬猶太人湧入新大陸。本土主義者雖然還在繼續他們排外的努力，但顯然是無法將幾千萬天主教和猶太教徒通通趕出美國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天主教和猶太教均接受為美國宗教了³²。天主教移民在美國社會逐漸站穩腳跟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多元文化為統治民族所接受的開端。

本土主義者除了力圖阻止移民浪潮以外，對於那些已經到達美國的移民，則是力圖去同化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曾推行過「百分之百美國化」的政策，促使移民學習英語和放棄從舊世界帶來的文化傳統。不過，這些移民從未真正放棄自己的文化。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少東南歐移民的子女開始在大學任教。他們一方面想追溯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另一方面則是對「同化」說提出挑戰。

意大利裔學者韋庫力(Rudolph Vecoli)在一九六四年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他以芝加哥的意大利移民為例，證明歐洲移民並非

³² 見 Will Herberg, *Protestant, Catholic, 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1955).

像翰德林(Oscar Handlin)所描述的那樣，一到美國便拋棄了自己的文化傳統，全面接受了安格魯·撒克遜的主流文化。事實上，意大利特有的家庭和宗教傳統在芝加哥的意大利社區始終頑強存在著³³。差不多與此同時，格雷澤(Nathan Glazer)和莫尼翰(Daniel P. Moynihan)又發表了他們的名著《超越民族的熔鍋》。這兩個人以紐約市的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猶太人等五組少數民族的經驗為例，證明所謂民族熔鍋(melting pot)從來便不曾存在。紐約的文化實際上是一個五光十色的拚花版³⁴。

都蘭(Jay P. Dolan)在一九七五年發表的《移民的教會》一書，不但探討了天主教移民和新教徒之間的衝突，而且還刻畫了移民天主教內部的各種矛盾。都蘭發現法裔、愛爾蘭裔和德裔的天主教徒之間圍繞著教會財產、神父的任命以及民族傳統等問題不斷地發生爭執。不過，這些爭執的結果，反而增強了各移民少數民族內部的凝聚力，最後，帶有本民族特色的各個天主教派別都得到了美國社會的承認³⁵。《他們自己的生活》是巴德納(John Bodnar)等人合寫的著作。這本書通過考察黑人、波蘭人和意大利人遷移到匹茲堡以後的適應過程來論述種族和階級之間的複雜關係。一般來說，白人移民所面對的只是雇主的剝削，但是黑人除了遭受經濟上的剝削以外，還要面對嚴重的種族歧視。這種複雜的環境和移民文化相互影響，

³³Rudolph Vecoli, "Contadini in Chicago: A Critique of the Uprooted,"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IV (1964).

³⁴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3).

³⁵Jay P. Dolan, *The Immigrant Church: New York's Irish and German Catholics, 1815-1865*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產生了三種不同的適應類型³⁶。蒙哥馬利一九八七年發表的《勞工家族的衰落》一書也是旨在探索種族和階級之間的關係。他發現土生工人的階級意識是在排斥少數民族移民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加強的³⁷。

新社會史目前存在的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新社會史總的走向是把問題研究得越來越細緻，因而它的每一個新發現都有很高的準確度。這也正是它的功績所在。新社會史通過一系列的個案研究(case studies)，成功地揭示出美國文化的多元性。現在大家已經很清楚，不同階級、不同性別和不同種族的美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可是，也正因為新社會史傾向於做個案研究和強調文化的特殊性，要提出有關美國歷史的概括性的解釋就顯得越來越不可能了。很多社會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我們現在對每一件具體的事瞭解的越來越多，但我們所知道的事卻越來越少。事實上，每逢有人對美國史提出一個較為概括性的解釋，很快就會有一批個案研究出來，用詳細和具體的事例來駁斥這種解釋。這裡我們不妨再舉一個例子。

麥克勞格林(Virginia Yans-McLaughlin)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家庭與社區》一書探討了紐約州巴佛羅(Buffalo)市的意大利移民社會。麥氏的研究告訴我們，意大利人移民到美國以後，在社會的意義上已經變

³⁶John Bodnar, Roger Simon, and Michael P. Weber, *Lives of Their Own: Blacks, Italians, and Poles in Pittsburgh, 1900-196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³⁷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為市民(urbanites)，但在文化的意義上仍屬於村民(folk)³⁸。本來，巴佛羅市的意大利移民人數不多，麥氏的研究已經相當細緻。可是她的書問世不久，另一位社會史學家格巴契亞(Donna Gabaccia)便出來向麥氏進行挑戰。格巴契亞的研究範圍比麥氏更小。她在調查了住在紐約市伊利莎白街上的意大利移民以後，用更詳細的數據告訴我們，意大利人移民美國以後，在社會上和文化上都發生了變化，根本不存在「文化上仍屬於村民」的現象³⁹。類似這樣的事例使得很多社會史學家都不敢再去探討大問題，而是把自己的研究範圍壓縮得越來越小。其實，我們很需要一本《美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樣的著作。然而，鑑於美國工人階級文化的複雜性，始終無人敢於承擔這項任務。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階級、種族和性別這三個因素之間的關係問題。大家都知道，這三者是相互影響的。我們在探討工人文化的時候，雖然是在強調階級的因素，但美國工人的內部又分為不同種族和不同性別的工人。語言、宗教和文化上的隔閡使得美國工人階級長期不能形成一個團結的整體。同樣，在婦女運動中，中產階級婦女和勞動婦女、白人婦女和黑人婦女往往也有著不同的關懷。她們之間的利益衝突，使得婦女解放運動比僅僅是婦女同男性至上主義之間的戰鬥要複雜得多。前面剛剛說過，有些學者已經在探索階級和種族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有人試圖解釋種族和性別這兩個因素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那一部社會史著作令人信服地解釋了階級、性別和種族這三大因素之間的關係。有些

³⁸Virginia Yans-McLaughlin, *Family and Community: Italian Immigrants in Buffalo, 1880-193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³⁹Donna Gabaccia, *From Sicily to Elizabeth Street, 1880-193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階級關係是美國歷史發展的主線，而性別和種族只是起輔助的作用。但這種觀點是研究少數民族史的人絕對不能同意的。在後者看來，種族問題在過去給美國社會造成的分裂和動亂遠超過階級衝突所帶來的影響。與此同時，女權主義者則建議用性別做為最主要的分析方法去研究婦女的歷史。這種莫衷一是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史強調文化特殊性的結果。

新社會史雖然挖掘出大量普通美國人的文化，但卻未能進一步探索這個文化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現在不少人已經意識到，只有研究政治和普通人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才能真正理解美國人是如何行使和如何傳送權力的，才能進一步瞭解美國歷史的本質。廣而言之，這涉及到社會上不同層次的文化是怎樣交流的這樣一個關鍵問題。可惜，許多社會史學家擔心回到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老路，總是有意迴避政治，遂使得上述問題長期得不到解答。新社會史存在的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是由於它「自下往上觀察歷史」的方法造成的。所以，要克服這些缺點也不是短期內能做到的事。

The Rise of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and Its Trends

Xinyang 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Social history represents a new historical school 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60s. Social historians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most common people in America—workers, immigrants, blacks, and women—and their activities. This new approach to history, i. e. “viewing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 has not only enabled scholars to uncover many unknown events, but also brought to question many established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Consider, for example, the Temperance Movement of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is movement had been viewed by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s an attack led by the Protestants on the Catholic immigrants. Now using class and gender as analytical methods, social historians discovered that the Temperance Movement had two more dimensions: class conflict and women’s liberation. Employers advocated temperance for fear that it would affect production when workers were drunk. At the same time, women also supported temperance because it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19th-century America for drunk husbands to beat their wives.

An immediate reason for the rise of the new social history was the Civil-Rights Movement and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of 1960s.

Decade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se people had accumulated tremendous amount of indignation which led to a series of unprecedented protest movements. These movements had convinced a group of historians of the pluralistic and conflict-ridden nature of American society. Thus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write about the most common people in America. A most important trend in social history is to focus on the local history of workers, immigrants, women and various ethnic groups. Such an approach has made historical writings more and more accurate. But because of social history's narrow focus, a general theory about American societ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make.

Key Words: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New Soci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Studies